

刘少奇同志故里导游词

各位游客，欢迎来到刘少奇故里参观。做文明游客是我们大家的义务，请遵守以下公约：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3、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5、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6、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7、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8、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

一、门楼—铜像广场

刘少奇故里占地面积 1000 多亩，建筑面积达到 3.5 万平方米，主要景点包括刘少奇铜像广场、纪念馆、文物馆、炭子冲民俗文化展览、故居、花明园等景点。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刘少奇故里牌楼，牌楼是 1998 年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建成的。“刘少奇故里”五个大字是由原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题写的。

刘少奇故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首批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地处长沙、张家界自然风光之旅，长沙花明楼韶山伟人故里游两条黄金路线的中枢连结点，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伟人故里红三

角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这个红三角，他指的是韶山毛泽东故里，花明楼刘少奇故里，乌石彭德怀故里这三个地方，他们相距只有数十公里，地理位置构成三角形的形状，所以人称红三角。这红三角因养育一代伟人而享誉中外。这里的地名叫做花明楼镇炭子冲村，在宁乡县志上就有记载：昔有齐公，择此筑楼，课其二子攻读其中，这栋两层小楼，就命名为“花明楼”，而这个地方，也因为楼而得名，沿用至今。少奇同志故里自古就树木繁茂，在明清时期，当地的村民们靠山吃山，伐木烧炭营生，人们管卖炭的人叫“炭子”，而山间的这块平地，就被称为“炭子冲”（注：冲是南方的一种说法，指山间的平地）

刘少奇同志故居自 1980 年重新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游客 2000 多万，平均每年达到 100 多万，2008 年 3 月 18 日刘少奇故里在全省率先免费开放以后，参观人数更是逐年上升，去年就接待了海内外游客 200 多万。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到这里参观。09 年，李克强、李建国等领导人来馆参观。

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刘少奇同志铜像广场了。它是 1988 年刘少奇同志诞辰 90 周年建成的，在少奇同志诞辰 100 周年时，进行了扩建。现在我们看到的广场达到 8000 多平方米。现在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矗立在广场中央的刘少奇同志铜像。铜像于 1988 年落成，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亲自为铜像揭幕，1998 年，江泽民同志题词。铜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捐建，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和他的高徒程允贤精心制作。铜像像高加底座共高 7.1 米，这个 7.1 寓意着两层意思，第一是党的生日，寓意少奇同志一生致力于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卓越的领导人；第二是少奇同志享年 71 岁，象征了他光辉伟大的一生。铜像坐东北朝西南，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日理

万机风尘仆仆的光辉形象。下面我们向刘少奇同志铜像三鞠躬。

二、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前方这个黄色琉璃瓦的怀念亭是由长沙市总工会捐建的，“怀念亭”三个大字由原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上将亲笔题写的。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完整、系统展示和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开馆于 1988 年 11 月 24 日。2008 年刘少奇同志诞辰 110 周年之际，陈列馆进行了扩建和重新布展，现在占地面积达到 7000 多平方米。主体是自由分散型园林式建筑，这种风格和炭子冲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趣，美丽自然。正门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匾额，是由邓小平同志 1987 年亲笔题写的。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一共有 5 个展厅。在内容上打破了原来一贯以生平为序的陈列模式，采用专题与生平相结合的办法，大手笔反映生平事迹。在陈列形式方面，把现代科技手段引入陈列当中，如硅胶塑像、幻影成像、电脑触摸屏、电视录像、景观复原等，使陈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本展览的主题是“伟大的探索者，卓越的领导人”。

大家看到序厅正中是一组主题雕塑，着力体现刘少奇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浮雕背面左右两侧分别设计成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背景，两侧的浅浮雕刻画了刘少奇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倾听群众呼声的情景。寓意刘少奇是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右边墙上是刘少奇 1962 年 1 月 27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句摘录：“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左边墙上是刘少奇的一句名言：“我

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两句话充分说明了刘少奇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远见卓识和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于人民公仆的伟大情怀。

第一部分 不懈奋斗 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第一组 寻求救国道路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诞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鲁氏勤劳善良，父亲刘寿生忠厚老实，受过一定文化教养。刘少奇从小勤奋好学，广泛地接触各种知识。经常同学周祖三家借书看，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曾参加过同盟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长沙等地办教育，家里书籍种类繁多，并且有国文、算术、地理等新式书籍，这些书籍深深吸引着刘少奇，又一次在周家火盆边看书非常痴迷，鞋子连被炭火烧着了都不知道。因刘少奇酷爱读书，乡亲们称他为“刘九书柜”。

1913年，刘少奇考入宁乡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学习。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积极参与爱国运动，确定了救国救民的决心和抱负，他特地把自己的学名“渭潢”二字改为“卫黄”，表达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刘少奇辗转长沙、河北、上海等地求学，1920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在这里，亲自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讲话，受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氛围的熏陶，学习了共产主义经典知识。1921年冬天加入共产党，确立了坚定的信仰。从此，刘少奇有一位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二组 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2年，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投入党的事业当中。这时党工作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湖南长沙，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会面。之后，少奇同志被派到江西安源，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当时安源的工人运动由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爆发的几次罢工都失败了。9月，刘少奇到达安源后，和李立三等一起，采取合理的斗争方式，领导安源一万三千多工人举行了安源大罢工。少奇同志作为工人代表只身进入敌戒严司令部谈判，得到上万工人声援，罢工取得全面的胜利。为了巩固罢工胜利的果实，刘少奇在安源创办工人夜校、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武装组织，并在安源发展党组织，创办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的党员人数有1922年的6人上升到了1925年的250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安源工运硕果累累，在全国工运低潮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1925年刘少奇来到广州，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建工作，后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先后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称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杰出领袖。

第三组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情绪。少奇同志根据形势变化，提出正确的方针，主张白区工作应采取以“防御为主”，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转变斗争方式的重要性。1929年刘少奇来到东北，担任中共第五届满洲省委书记，先后领导了奉天纱厂工人运动和中东路失业工人复工斗争，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

展。并且对白区工作应当采取的策略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的白区工作路线方针。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刘少奇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先后担任红八、红五军团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会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北方局的工作。为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少奇同志在华北进行积极的统战工作，坚持团结各派军队，争取阎锡山，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人物抗日。指示学生游行队伍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哲元转向抗日，壮大了华北的抗日队伍。

为了充实北方党的力量，1936年，经中央批准，刘少奇组织营救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名干部出狱。61名干部出狱以后，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方局的党组织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推动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白区工作一针见血的医生”。

第四组 领导创建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任北方局书记。

根据党确定的方针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少奇同志于1937年10月发表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是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解决了游击战争中许多政策性的问题。1938年他指示筹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华北的游击战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正面战场失利，太原、徐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华北日军兵力空虚，华中大部分土地沦陷。1938年9月刘少奇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依靠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会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1939年初，刘少奇来到中原局机关驻地河南确山竹沟，在这里开始部署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1939年底—1941年初，刘少奇率领中原局在安徽省定远县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步骤，以及新四军的战略方向：东进，东进，再东进。明确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和反磨擦方针，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刘少奇领导下，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面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1940年3月刘少奇领导指挥了半塔保卫战，打退了顽敌韩德勤部的进攻，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为了向苏北发展，刘少奇调八路军黄克诚部队从华北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取得郭村战役、黄桥决战的胜利，歼灭韩德勤部万余人。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到达东台，在白驹镇胜利会师。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至此，东进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基本完成。

面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发起了又一次的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央认为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双面反攻，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刘少奇冷静权衡利弊，提出“政治上坚决反击，军事上暂缓进攻”的方针，建议中共中央重组新四军，并担任新四军政委以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担当起重组新四军的重任。新四军整编后建制七个师，总数达到了9万多人，并不断发展壮大，开辟了华中抗战新局面。1941年7、8月间，在盐城保卫战中，刘少奇领导华中军民一举歼灭日寇一万七千多人，取得反“扫荡”的巨大胜利。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三年华中敌后抗战硕果累累，到1941年底，发展抗日武装15万人枪，根据地2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0万。刘少奇顺利完成了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42年，毛泽东多次致电刘少奇回延安，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筹备中共“七大”的召开。1942年底，刘少奇从苏北出发回延安。面对日军疯狂“封锁”，“扫荡”，刘少奇和随行的一百多民干部，一路艰苦前进。在过微山湖的时候，由铁道游击队护送，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经过9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穿过了敌人的103道封锁线。1943年底，刘少奇抵达延安。1943年，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正式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第五组 参与领导解放全中国

抗战胜利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东北交通便利、工业发达，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刘少奇审时度势，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战略决策，调遣部队十一万多人，干部两万多人抢占东北，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向南持防御之势，避免各个击破。后来的史实证明，挺进东北的战略决策为我党争夺了有利的战略地位。

1947年，国民党大规模轰炸延安和山东两个解放区。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兵分三路，刘少奇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广泛发动农民支援前线，1947年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使得北方的农民终于翻身当了主人，分得了自己的田地。翻身农民政治热情高涨，积极支前支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第二部分 艰辛探索 为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组 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后，受党中央的委托，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构想。刘少奇认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早的取消资本主义是犯左倾错误。1949年1月，刘少奇撰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文中提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的优势，但国营经济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 10 到 15 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工作制定方针政策。刘少奇在会议上主要阐述了城市工作问题，他提出：“全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大城市中出现工人们要“清算”、“分厂”等左倾苗头。资本家忧心忡忡，停产停工，对共产党接管城市后的政策采取观望态度，许多地方出现工人“闹事”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指导工作。在这里，在这里少奇同志召集天津的干部、职工、资本家进行座谈，大力宣传党的“公司兼营，劳资两利”的政策，给资本家做工作：不要担心剥削多，罪恶大，中国目前资本主义剥削相对封建剥削是进步的，是有功劳的。并鼓励资本家多办厂、办好厂。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渐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天津的工商业情况大有好转，为全国的城市管理工作创造了模范的经验，稳定了全局。

第二组 主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 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负责政治工作报告。他为了全方面了解国民经济的情况，先后召集了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全

面论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迅速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总方针。他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大会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首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组 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

1958年，由于急于求成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加上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时期。1960年，大跃进难以为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刘少奇开始着手国民经济调整。为了了解农村发展的真实情况，1961年4月到5月，刘少奇回到家乡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他轻装简行，居住在王家湾生产大队猪场的饲料房里；他走村串户，了解乡亲们的真实生活；在故居的横堂屋里，他找来幼年时的好友和乡亲促膝谈心。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刘少奇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认识到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做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年，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并做了口头发言。分析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缺点成绩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为全党把思想认识进一

步统一到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和研究经济调整工作。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经济工作，有力地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决定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的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见效。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结束了连续4年赤字的情况。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就。

第四组 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一) 变革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它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刘少奇首先提出要改革单一的计划经济。1957年4月17日，刘少奇就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自由市场问题》中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还指出：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

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

（二）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

刘少奇非常关心农村工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改革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第一，他强调农村生产关系要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1957年2月，刘少奇在河南新乡农村视察（照）时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第二，他赞同在农业生产管理中实行劳动生产责任制。1957年2月，刘少奇在河南新乡视察时，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事实证明，改革和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三）改革流通体制

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工业体系实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纵向管理体制和产品统一调拨的分配方法，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生产单位由于没有经营自主权和独立核算权，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照）上，刘少奇首次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他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理论恐怕还值得研究。”他在陕西、四川（照）、上海视察期间指出：物资管理办法要改革，要象商业部门管理生活资料一样。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刘少奇先后八次听取了关于物资工作的情况汇报，两次提请中央批转了改革物资工作的方案。经过几年的改革，到1966年上半年，我国省、地、市、县各级普遍建立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的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组织起一支从事物资管理和经营的专业队

伍；理顺了物资流通体制。

（四）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开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许多地方出现学生升学难、就业难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并大力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在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与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八小时工作劳动制度与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的设想。1958年5月，天津市第一所厂办半工半读学校正式开学。

此外，刘少奇对“两种劳动制度”还解释过另一个含义，就是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

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推行，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向广泛性、多样性形式的发展。到1965年，全国有半工半读学校4000多所，学生80多万。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到1965年6月底，全国有2500多个单位采用了合同工、临时工和季节工的做法，人数达到58万余人。这些做法，对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人民群众的学习和就业机会，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五）改革分配体制

建国以后，在分配体制上，一开始就存在“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因素。刘少奇对此早有觉察，1957年他曾建议“要较多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他认为“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研时提出在农村要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即除了定额记工、定额管理外，还可以把一部分田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

给社员适当的自留地，要适当提高手工业工人的收入。在工矿企业要有奖励制度。

（六）试办托拉斯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曾设想组织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出现“多条分割”、“自成体系”的状况。为此，刘少奇提出组织托拉斯、改革生产管理体制，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

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视察河南洛阳轴承厂和上海电机厂时，又提出要组织托拉斯来管理经济。1963年，刘少奇在关于企业改革的讲话中指出：“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行”。党中央同意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建议，于1963年批准成立中国烟草公司。之后，我国又试办了23家托拉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

刘少奇关于试办托拉斯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我国企业经营机制思路的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长久、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与研究，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内容、途径、保证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理论。

1953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22次会议（照），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4年6月11日，刘少奇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照），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照）上，刘少奇提出要限制领导人员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员的监督，并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他指出：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权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文摘）。

1951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复制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概念，主张“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刘少奇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为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部分 殚精竭虑 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党

第一组 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涌向延安，并且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这一方面壮大了党的

力量，另一方面也使革命队伍的成分和思想意识复杂起来，因此，如何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修养，成为党面临的迫切问题。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广场上，给学员作《论共产党的修养》的演讲。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和意义。刘少奇的演讲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反响强烈。毛泽东评价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周刊第八十一期至八十四期上连载。后来这本书以不同的版本和语种发行了上千万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员的人生教科书。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党理论宝库中不朽的经典。首次从个人修养方面论述党员的标准。对当时的青年、党员、干部影响深远。王首道回忆，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战士都有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雷锋同志的枕边有，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们的衣兜里也有……直到现在，这本书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山东金乡一位农民石刻家胡奉林，他的祖父从小参加革命，读过《修养》，对少奇同志感情非常深。胡奉林自幼喜爱书法艺术，学过石刻技术，他的妻子周香云也精通石刻手艺，他们为了宣扬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决定把《修养》刻在石板上，历时一年，终于全部刻在了高2米、宽50公分、厚2公分的天青石板上。2010年刘少奇诞辰112周年之际，胡奉林夫妇将这套石刻赠送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第二组 倡导党内正确思想斗争

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和思想素质教育，1941年4月，刘少奇在盐城领导创办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亲自兼任校长。1941年7月2日至3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了《论

党内斗争》的重要讲演，系统阐述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系列问题，努力倡导在党内进行积极而正确的思想斗争。他明确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像刘少奇这样全面系统地集中论述党内斗争的问题还是第一次。

1942年刘少奇奉命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调解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刘少奇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做了《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系统分析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偏向，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过火斗争的种种表现及其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再次阐述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经过几个月耐心细致的工作，妥善调处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之间的矛盾，开创了山东工作的新局面，模范实践了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

第三组 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刘少奇自觉担当起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任，为此作了巨大努力。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刘少奇的报告把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

第四组 致力于执政党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当时他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告诫全党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并要健全党内生活，端正党的作风。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1980年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部分 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一组 人民公仆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时刻将人民群众记挂在心上，时刻注意履行“人民勤务员”职责。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利用开会、调查、视察、参加劳动和休假的机会，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人民的困难和疾苦，与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刘少奇非常注重实际调查，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进行视察，与全国各地的群众亲切交谈，一起耕作一起劳动。建国后，刘少奇分管青年工作，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祥的老

人；在青年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和最可信赖的良师、益友。

1959年10月26日在全国群英会上，刘少奇亲切接见全国劳模代表——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照）。刘少奇紧紧握住老时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还把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老时，鼓励他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中国已有400多个城市把10月26日这个国家主席和清洁工人握手的日子定为“环卫工人节”。

刘少奇每次外出时都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做到“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这是1958年7月刘少奇乘坐普客硬座列车去济南视察途中，与同旅客谈笑风生的情景（照）。

第二组 外交使者

刘少奇说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刘少奇长期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这些是国际友人送给刘少奇的礼品，以及出访时穿过的灰色中山装和皮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刘少奇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

1949年至1960年，刘少奇曾先后四次出访苏联。

当时的国际环境处在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孤立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打开我国外交关系

的新局面。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1966年3、4月间，刘少奇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访。刘少奇大胆的外交实践为维护我国主权，争取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充分显示出了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三组 务实求真

为了了解国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进行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当时，刘少奇就是坐着这样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回到了家乡。他调查的第一站是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63岁高龄的国家主席把生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当作办公室工作、居住了7个晚上。在这里他看到所谓的“万头猪场”养猪不过几头，在屋后的山头拨开风干的人粪便，见到的尽是菜渣和草根，他深感情况已相当严重：农民吃饭已经成为大问题！在天华大队施家冲开座谈会时，国家主席脱下蓝布帽，向群众鞠躬行礼，请大家讲真话。

为了进一步了解调查情况，5月3日，刘少奇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花明楼炭子冲，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在旧居座谈。他曾找来幼年时的好友李桂生到儿时游泳的安湖塘了解干旱的情况。李桂生说干旱不是主要原因，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经过深入的调查走访，刘少奇了解了农村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组 亲友情深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骨肉亲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他们在工作

中竭诚合作，生活中同甘共苦，这种战友情谊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刘少奇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刘少奇十分敬重和关心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也非常信任和尊重。“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遭受错误批判时，宋庆龄依然对刘少奇一家十分关心。1966年11月《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选集》出版时，宋庆龄冒着风险将这两本书送给了刘少奇，并亲自在扉页题写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宋庆龄”的赠言；刘少奇十分注重和各民主人士的联系和交往，他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王光英、李济深、程潜、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等人交往密切。

刘少奇少小离家，南征北战，他仍旧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山水水，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时，亲切接见了家乡的干部群众。这次回家调查，刘少奇还看望了姐姐刘绍德，送给姐姐的礼品是：大米5斤、饼干2斤、糖果2斤、盐蛋9个、猪油2斤。他还安慰姐姐：“现在是暂时困难时期，您要和社员同甘共苦啊！”

刘少奇是一位建功立业的伟人，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凡人，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骨肉亲情。1948年秋，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成终生伴侣，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20个年头。他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和照顾，堪称革命伴侣的楷模。刘少奇对事业的严格要求，对子女的良好教育，给子女们以深远的影响。刘少奇常教育子女们：“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儿女们也没有辜负父母和人民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尾声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共

和国主席刘少奇更是首当其冲，遭受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66年8月，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骤然降至第八位。随着运动的疯狂发展，他的所谓“罪名”又被升格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1968年，在党的极不正常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在全会举手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为捍卫真理，拒绝举手（照）。

“文革”期间，尽管全国上下充斥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仍有人挺身而出，为真理与正义而奔走呼告。长春的干部史云峰在“文革”期间冒着风险在街头张贴传单，要求为刘少奇平反。辽宁的女干部张志新写下了《不能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加罪名》一文，为刘少奇鸣不平。

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据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1967年8月5日，在又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1954年的《宪法》（复制件）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等离子音像）但是在那样人妖颠倒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能保证国家主席的尊严不受侵犯。

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毛毯包裹着身体，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刘少奇含冤逝世，享年71岁（照）。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鲜花，更没有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把刘少奇的遗体当作“烈性传

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冒称他儿子刘源填写的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竟然是“无业”（复制件）。泱泱大国七亿人民的主席，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辈子，最后竟换来“无业”二字！

但是，刘少奇即使是处在最危难的时刻，始终都相信人民群众。他和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的一张标准像，文革期间，花明楼农民罗德明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张画像（像）。他先把画像藏在毛主席像后面，后来又把画像折成小方块藏在阁楼上的旧帐本里。这是各地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复制件）。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复制件）。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邓小平说：“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向王光美表示亲切慰问（照）。邓小平对王光美说：“是好事，是胜利！”

刘少奇曾经说过：“将来，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遵照他的遗愿，1980年5月19日，在山东青岛刘少奇生前视察过的101号驱逐舰上，亲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真理得以证实后，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缅怀一代伟人，1998年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江泽民亲切会见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

美，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2008年11月11日，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发表讲话，肯定了刘少奇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杰出贡献。

三、刘少奇文物馆——炭子冲民俗文化展

前面是刘少奇文物馆，它是少奇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建成的，集文物收藏、文物展览、文物研究于一体，分三个展厅，定期举办各种临时展览。现在这里陈列的是王光美生平业绩展和王光美同志在木樨地住所的陈列复原。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整个景区最美的一条林荫道，这两边的树是香樟，它是长沙市的市树。看着这一排排的大树，想起少奇同志小时候写过的一首诗，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他年成大树，必是栋梁材！少奇同志的这首歌也被谱上了曲，创作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

大家看到左手边这两颗桂花树是2006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亲手栽下的。右手边是炭子冲民俗文化展，由王光英同志题词。它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江南农家小院为原型修建，里面陈列了湖南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反映了江南农村的习俗。在这里有一些活动，如现煮现卖刘家老酒、动手操作加工粮食、擂茶等等，大家可以去参与去感受一下！

四、刘少奇同志故居

大家看到的这栋座土木结构的普通四合院就是刘少奇同志故居，它坐东朝西，前临绿水，背靠青山，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风景宜人，有着古朴浓厚的江南气息。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栋普通的农舍也和少奇同志一起经历了非凡而坎坷的岁月，可它依然基本保持这 130 多年前的原始风貌，这便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思索意味深长的谜。随着参观的深入我们将会找到它的谜底。请大家抬头看，槽门上的门匾“刘少奇同志故居”是 1982 年冬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

走进院子，正堂屋门楣上方还有一块“刘少奇同志旧居”的门匾，这块门匾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它是 1959 年故居第一次对外开放时悬挂在槽门上的。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一片喧嚣中开始了，人民的主席刘少奇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他的故居很快被封闭。这块门匾也被红卫兵取了下来，堆放在公社的杂物堆里准备烧掉。花明楼公社的炊事员周思九怀着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感情，偷偷地把这块门匾从杂物中拣了出来，翻过来作为切菜的案板使用。就这样，这块门匾经过五任炊事员的巧妙保护终于得以保存下来。1980 年 2 月，少奇同志平反以后，故居重新对外开放，家乡的乡亲们又欢天喜地将这块门匾悬挂在故居的门楣上。

这座四合院里曾住着两户人家。当年少奇同志的祖父分家的时候，以堂屋正中为界，左右各一半，南边分给了少奇同志的父亲刘寿生，北边分给了少奇同志的伯父刘丙林，正堂屋两家共用。因少奇同志的伯父不善持家，家境逐渐衰落，在 1930 年将属于他的那一半房子卖给了一个姓夏的人家。少奇同志家中共有房屋 21 间半，其中瓦房 16 间半，茅房 5 间。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 1961 年刘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和夫人王光美同志在旧居门前的合影。

大家往右走，便来到了少奇同志的二哥刘云庭的卧室。少奇同志共有兄妹 6 人，3 个哥哥，两个姐姐，少奇同志最小。二哥刘云庭曾参加过

湖南新军，担任过班长、排长、连副等职，见多识广、思想进步。给青少年时代的少奇同志以极大的思想启蒙。1949年二哥去世后，少奇同志亲撰挽词：“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这是1938年刘云庭送少奇同志的长子刘允斌（左一）以及他自己的儿子刘允明（右一）去延安锻炼时与少奇同志和少奇同志的长女刘爱琴（右二）的合影。

接下来我们参观的是少奇同志的卧室，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61年回乡调查时，他坚决拒绝了省委和县委为他安排的条件较好的招待所，就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六天六晚。他说：“我是回乡搞农村调查的，住在招待所的高楼大厦里与人民群众疏远了，住在自己家里，乡亲们来去自由，挺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陈旧的书桌，这盏古朴的煤油灯就是当年刘主席在家办公的全部用品。他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这里思考着使中国发生重大转机的国家大事。

少奇同志的父母都是勤劳致富的典型，他从小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精耕细作的家具，收成好时可以节余些粮食用来酿酒。自给自足之余，还可卖一些给邻里乡亲。这间房子就是当年用来储酒卖酒的。

靠南角的这间房子是少奇同志的大哥刘墨钦的卧室。刘墨钦忠厚老实，是父亲去世后家庭的主要支撑者。

接下来我们便来到了少奇同志父母的卧室。画像上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少奇同志的母亲鲁氏。她是一位善良贤慧、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少奇同志的父亲刘寿生于1910年，是位忠厚、能干、很善于持家理财的农民，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46岁时去世后，母亲鲁氏便承担起抚养6个子女的重担。少奇同志非常尊敬他的母亲。作为一位致力于救世济民

的革命家，他很难尽到为人之子的孝道。1925年，少奇同志回长沙时，曾把母亲接去治病，并替她补做了60大寿，还专门请人为母亲画了这张像。少奇同志的母亲于1931年病逝，终年66岁，当时他正在白色恐怖上海的宠罩的从事地下斗争。这张画像陪伴着少奇同志南征北战，度完了他整个非凡的人生。

这间横堂屋便是农家的客厅，与天井相连，故显得特别明亮。1961年少奇同志轻车简从来湖南作调查，希望家乡的人民能对他说几句真话。所以他主动把当地的泥脚杆子请到自己家里来。大家看到的这组照片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国家主席和家乡的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聊天、拉家常。在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取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诚恳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现在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感到对不起大家，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在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在这里，他深深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生活极端困难的原因，正如乡亲们所说的那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里，他作出了顶住“五风”，解散食堂这一重大决策。也就在这里，少奇同志办理了一桩私事：他回乡时，当时政府就修缮故居和创办纪念馆的事向他请示，他坚决予以拒绝。同时他看到因为公共食堂拆掉了一些民房，好几户村民无屋可住，他把这些村民召集在一起，说要把房子分给他们住，村民们摇头摆手不敢接受。少奇同志恳切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少奇同志诚心诚意，村民实在无法推辞，于是六户村民先后住进了少奇同志的旧居。这就是为什么旧居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也能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原因。

与横堂屋相连的是少奇同志的三哥刘作衡的卧室。刘作衡写算俱全，曾做过湖南省政府的参事室秘书。

这一间是吃饭屋，旧时农村因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家里来了客人，妇女和小孩只能到厨房吃饭。1961年回乡时，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以及工作人员都是在这里就餐，他曾对王光美同志说：“你了不起哟，以前我家来了客人，母亲和小孩子都只能在厨房里吃饭呢，现在是妇女半边天了……”

这间十分宽敞亮亮的房子是碓屋，这是贮存粮食的板仓，这里有舂米的推子、碓子，还有风车。这是个斛桶，是一种量具，一斛30斤。青少年时期的少奇同志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他用这个斛桶量米给邻居时，总是堆得高高的，遇到贫困的邻居来买米时，他还偷偷把钱埋在米里边，乡亲们都说这九伢子心肠太好了（少奇同志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1961年，王光美随少奇同志回乡时，曾饶有兴趣地在斛桶旁留下了这张照片。这间僻静的小屋是少奇同志的书房。窗外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庭院，少年时代的少奇同志常在这读书学习，由于他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当地一博学之士誉之为“刘九书柜”。1917年，少奇同志考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寒暑假都在这里学习，在窗外的院子里练棒习武。

书房的两边是杂屋。刘家田土不少，农具十分齐备，称得上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农具展览馆了。那边是猪栏，等会大家在门口还可以看到牛栏。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养牛犁田，养猪过年”，猪肥牛壮的日子算是过得顺畅了。

好，迂回曲折地转了一圈后，我们又和碓屋隔井相望了。这中间隔

着的是个小天井，小天井是用来采光和排水的。

少奇同志家里人口多，厨房也就很宽敞，锅灶俱全，这边还有一间专门放腌菜的杂屋。隔壁还有个小小的烤火屋。冬天里一家人围炉而坐，很暖和的。这个叫梭筒钩，别的地方见不到的稀罕物，它利用杠杆原理，下端可以挂水壶，饭锅等，根据火力的大小还可以上下调整。大家往上看，梭筒钩上方横着一竹竿，农家通常用它悬挂鱼肉、猪肉，下面的烟一薰，鱼肉、猪肉黄灿灿、香喷喷的。这边有茶罐、酒罐。这里还有一个草鞋马，茶余饭后，可以围坐火炉边编草鞋，江南的农家，一物一时都是不能荒废的。少奇同志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俭朴而又较为殷实的普通农家里。

我们沿着那条样小道出去，就可以到达炭子冲学校，也就是以前的朱家祠堂，是少奇同志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现在是宁乡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从前面左手边那条小路里边，是刘家祖坟。它是少奇同志的曾祖父刘再洲的墓地。和故居一样，它曾经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文革时期，刘家祖坟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红卫兵的破坏，幸好附近的村民得到消息后及时赶来制止，墓穴才得以保留。02年，我们馆也根据当地刘家后人的描述，恢复了祖坟的原貌，04年，刘家祖坟还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花明园

为了寻求革命纪念地与旅游观光区的最佳结合，刘少奇故里在以铜像广场、纪念馆、故居为核心景点的“红色旅游区”外，还精心打造了以花明楼、修养亭为重要景点的“文化旅游区”花明园。花明园是集旅游观

光、湖湘文化、德育教育于一体的文化主题公园，占地面积 200 多亩。2003 年 11 月 24 日，少奇同志诞辰 105 周年之际建成开放的，当时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他的儿子刘源都亲临花明楼参加了开园仪式。花明园有花明楼、修养亭、一叶湖、万德鼎、九龙柱、少奇同志乘坐过的飞机、王光美雕塑纪念园等文化景点。花明楼，是 1998 年少奇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兴建的一座百尺高楼，关于“花明楼”名字的由来，还有个典故。相传过去这里的靳水边有座小楼，一位学识丰富的老先生在楼里教了几名学习刻苦的学生，每天都能从楼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每逢春季，河边翠柳飘摇，田野鸟语花香，汇合楼里清朗的书声，让人联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小楼也因此得名。花明楼共五层，建筑面积 2030 平方米，主楼顶层檐面悬挂着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的“花明楼”的匾额。楼内陈列了“宁乡十景”、“宁乡出土的青铜器”、“湖湘文化名人”及“青年刘少奇”的雕塑，向大家展示宁乡风光秀丽、物华天宝的自然环境和人杰地灵的文化氛围。以及花明楼“百花争艳、鸟语花香”的景观意境。

从花明楼出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化广场占地面积 4000 多平方米，集中体现德文化的深厚内涵。主要有万德鼎、九龙柱、一叶湖等景观。鼎，是古代的青铜礼器，代表主权与尊严，象征坚实和稳定。文化广场中央的这座万德鼎，由 16 块方形麻石组成，鼎身以宁乡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人面纹鼎”为模型。四面正中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书写的“德”字。其余还有 9996 个历代名家书写的“德”字。湖南省委副书记、当时的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撰写了《万德鼎铭》。石鼎沉稳大气、气势恢宏，是整个园区德文化的点睛之笔。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儿女奋发腾飞的精神写照。广场周

围耸立着 9 根龙柱，上面刻有一条栩栩如生的盘龙。“九”寓意为九九归一（祖国统一）和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万代相传、长盛不衰。环抱文化广场的这片水域叫一叶湖，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取名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先生的“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赠给一位巡抚的《风竹图》上题写：“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此体现少奇同志心中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高尚风格。四周配以石拱桥、假山、凉亭、杨柳、紫薇等，使整个园区显得简洁明快、生意盎然。

花明楼对面的仿古建筑修养亭则是为了纪念少奇同志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建立的。“修养亭”由全国政协委员、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铎题写。旁边配有楹联“德才配天地，修养冠古今”。亭内以碑刻为主，前院左墙篆刻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高度评价。前院右墙摘录了刘少奇在文中引用的孔子、孟子等历史名家的言论。修养亭内院，我们设计了松、竹、梅“岁寒三友”的园林布局，喻意少奇同志历经磨难而不屈服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德。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刘少奇同志坐过的飞机”（伊尔 18-240 型飞机）。伊尔 18-240 型飞机是前苏联生产的涡轮螺旋桨中程客机，机身长 36.9 米，翼展 37.4 米，自重 32 吨，是我国 1959 年购买的第一批（共 5 架）伊尔 18 型飞机中仅存的一架。伊尔 18-240 专机保存较为完整，机内的座椅和休息舱内的军用床是飞机上的原物。

伊尔 18-240 号飞机作为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领导人都曾乘坐过。它曾伴随少奇同志参加过许多外事活动，在巩固和发展中外友好关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63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16 日，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成第二次亚

非会议的召开，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亲自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该专机曾随同出访；中苏论战前夕，由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为征求友党的意见，我国曾邀请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来华商议，1963年5月28日，刘少奇曾专程陪同金日成乘坐该机从北京去武汉会见毛泽东。

经该机经当年驾驶过的机长和机械师鉴定，确认无疑，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刘少奇纪念馆于2001年4月开始征集这架飞机，于2003年9月2日顺利落户花明楼。停机坪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呈“九”字形状。